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由来与发展

□ 罗平汉

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确立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个基本方略。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要求。这一重要原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逐渐形成与完善。

（一）

提出坚持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是从党建立自己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为开端的。在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赴井冈山途中，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部队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班、排设党小组，支部建在连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在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曾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提出批评，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处于党的绝对领导下。各个革命根据地建立后，事实上确立了党对根据地一切工作的领导。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被改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的规定》，明确规定“领导党的一切工作，保证党在部队中的绝对领导”是军队各级党委会的重要任务。1938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反复强调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在这里，毛泽东以十分简短的语言，深刻地阐明了党和军队（也包括其他一切组织）是指挥与被指挥即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毫无疑问，革命战争年代军事是党的中心工作，确保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实现一切工作领导的根本与保障。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共合作的特殊背景，加之各根据地处于被日伪分割包围的状态，为了加强党的领导，1942年9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这就明确了党与军队、政府及其他组织的关系，确立了党是领导一切的基本原则。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根据地实行一元化领导的精神，各抗日根据地进一步理清了党、政、军、群等各种组织之间的关系，加强了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1942年11月2日，贺龙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关于整党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党是最高级的组织形式，是领导一切的，要领导政权、军队和民众团体。军队不能闹独立性，政权不能闹独立性，民众团体也不能闹独立性。”1943年2月20日，邓小平在大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也强调：“武装、政权、群众、党四种力量如何联系与配合呢？首先是党的领导问题，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从此，在革命根据地“党领导一切”成为人们的共识。正因为，在革命根据地坚持了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保证了党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将革命力量有力

地汇聚在一起，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二）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还来不及制定宪法，但有一个起着临时宪法性质的重要文件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在《共同纲领》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问题，但它强调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对新中国的领导，必然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去实现，这实际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之初，针对一些部门和地区存在的分散主义倾向，中共中央多次强调必须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一再重申“党领导一切”的原则不能动摇。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规定：“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1956年9月15日，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上的政治报告中亦强调指出：“党应当而且可以在思想上、政治上、方针政策上对于一切工作起领导作用。”

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强调“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1958年7月12日，邓小平在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共青团三届三中全会有关情况汇报时强调：“党是无产阶级最高组织形式，有人总是不大愿意承认这一条。党领导一切，是一切问题根本的根本。”1962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特地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大会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

改革开放后，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建立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的制度。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地方和部门曾一度出现忽视党的领导的倾向。因此，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坚持党对改革开放和各项工作的领导，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十九大把“党是领导一切的”写进党章，并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进宪法，为更好地坚持和贯彻“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根本原则提供了坚实保障。

（三）

早在1929年9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写给中共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九月来信”）中，就指出：“一切工作归支部”“绝对不是说党的一切工作、一切事务、一切问题都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一再强调，所谓领导权“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并指出：“什么叫做领导？它体现于政策、工作、行动，要在实际上实行领导”。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如何体现党中央及各级党委对政府、对财经工作、对工业建设等各项工作的领导责任，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都必须统一由党中央制定……各中央机关及各级党委则应坚决保证党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一切决议、指示和法令的执行。”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了党委领导原则32字方针，即“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毛泽东解释说，“大权独揽”是指主要权力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各方去办”不是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在企业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方才去办；“不离原则”的“原则”是指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中央和上级的决议等。

对于新时代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也有许多深刻的论述。他指出：“党的领导，体现在党的科学理论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上，体现在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上，同时也体现在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和强大组织能力上。”他还说：“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和国家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如何正确贯彻“党是领导一切的”提供了基本遵循。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

林祥谦：我党工运事业的先驱

□ 林友华

从福州市区沿着福厦公路南下，过了乌龙江大桥就进入祥谦镇地界，再行车几分钟就到了林祥谦陵园。凡是参观祥谦陵园、深入了解林祥谦的人都不不为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与高尚人格而感动。

生性豪爽，乐于助人

林祥谦1892年出生于福建闽侯尚干一个农民家庭，14岁时就因生计所迫进入马尾造船厂当钳工学徒，过着异常艰难的徒工生活。20岁时通过技工考试，进入武汉铁路工厂当钳工，成为中国早期产业工人的一员。

经陈潭秋等共产党人的教育培养，林祥谦于1922年夏天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时，全国党员总数为195人，其中包括一些产业工人，林祥谦是其中之一。

林祥谦家境贫寒，生活俭朴，却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具有较高的思想境界。当时铁路工人深受压迫，普遍处在贫困之中，林祥谦也不例外，也是经常缺米少菜，不得温饱。但他却热衷于舍己助人、扶危济困之事，不管哪个省籍的工友有困难，他都倾囊相助。

有一次，林祥谦发现有位湖北籍工人家里已经几餐揭不开锅，就准备把自己家的十几斤米送给这位工人。父亲皱起眉头问：“祥谦，我们家已经连3顿稀饭都难以继，你还把这些米拿去做什么？”林祥谦把那位工人家的困境告诉父亲，说：“爹啊！穷人有困难要相帮，我们一天有3顿稀饭，人家已经3天没有米下锅了。”深明大义的父亲知道情况后也马上表示支持儿子的义举。有个湖北籍工人的孩子患了绞肠痧急病，生命垂危。林祥谦知道后，急忙跑回家，不顾自己的女儿林汉玉也在感冒发烧，把棉被当了3块大洋，送到那个

工人家中。那位工人感激地说：“祥谦，你待我们湖北人太好了！”林祥谦热情地拉着他的手说：“不要分什么福建人、湖北人，天下工人是一家呀！”

林祥谦以坦荡无私的襟怀团结工人，努力消弭各帮口之间的隔阂，全心全意为工友谋利益，获得大家高度信赖。1922年2月，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他当选为财务干事，“公私分明，丝毫不苟，为同事所敬服”。年底，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工会成立后不久，林祥谦便被推为该会委员长。身为福州人的林祥谦能够在武汉成为铁路工人中表率群伦的领袖人物，委实是林祥谦在性格、气质、能力、品行等方面所体现的人格魅力所致。

投身工运，掀起高潮

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兴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林祥谦则是在这风口浪尖的弄潮儿。

当时京汉铁路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剥削中国人民的吸血线，又是封建军阀搜刮人民、进行军阀混战的工具。铁路工人“成年累月做马牛，吃喝如猪穿如柳”，就是当时他们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们悲愤地发出：“军阀网罗沾满血，工人何时能出头”的呼号。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运动迅猛发展，到1922年底，全路各大站先后成立了16个分工会。

为了统一全路工会以适应斗争的需要，决定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遭到反动军阀吴佩孚的野蛮阻挠。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不顾反动军警干扰破坏毅然如期召开了成立大会。下午，反动军警占领了总工会会所。代表和来宾的住处也受

到包围和监视，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为了争人权、争自由，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于2月1日晚上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从2月4日起，举行全路总同盟大罢工，以抗议军阀的压迫，并成立了罢工领导机构，决定将京汉铁路总工会由郑州迁至武汉江岸办公。

2月3日，京汉铁路总工会从郑州迁移到江岸，这里就成为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斗争的中心。身为江岸分工会委员长的林祥谦就成为革命斗争上举足轻重的领军人物。

2月4日上午9时20分，江岸机车厂的罢工汽笛震撼长空，拉开了全线大罢工的序幕。中午，在不到3个小时内，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驶，长达1200多公里的京汉铁路线顿时瘫痪。

慷慨赴死，壮烈牺牲

在大罢工中，林祥谦始终奋不顾身地坚持战斗在第一线，用自己的行动和鲜血诠释了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共产党员初心本色。

2月7日，罢工进入剑拔弩张的紧要关头，林祥谦深知自己面临的生命危险，在回家吃饭时就告诉妻子：“敌人是不甘心的，是会下毒手的，咱要有思想准备。死了一个工人，会有千百方工人站起来。”饭后，他抱着慷慨赴死的决心赶到罢工指挥部。实际上，这时林祥谦不是没有机会躲避的，当时同在武汉的大罢工领导人有的就避险成功。而林祥谦则认为自己身为共产党员，越是在危险的关键时刻越要站在前头，与工人兄弟们同生共患难！

傍晚，督军署参谋长张厚生带领两营全副武装的匪兵，包围了江岸分工会，长江上的帝国主义兵舰，也派兵登岸配合。

顷刻之间，枪声骤起，纠察

建党时期创办最早的革命干部学校

□ 陈安杰

在风雨如晦的20世纪20年代，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新渔阳里6号的石库门里创办了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取名为“外国语学社”。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众多干部学校中，外国语学社算是最早的一个。它既是建党早期为全国各地离开家庭和学校要求进步的青年搭建赴俄学习的平台，也为处于秘密状态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提供了公开开展革命活动的场所。

在风雨如晦的20世纪20年代，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新渔阳里6号的石库门里创办了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取名为“外国语学社”。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众多干部学校中，外国语学社算是最早的一个。它既是建党早期为全国各地离开家庭和学校要求进步的青年搭建赴俄学习的平台，也为处于秘密状态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提供了公开开展革命活动的场所。

以公开办学的形式掩护革命活动

1920年1、2月间，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书记处的领导人之一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提议，由远东局外国处组建一个代表团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前往中国，指定维经斯基为负责人。这个代表团的重要使命就是“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在列宁给代表团下达的3项任务中，其中有一项就是“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

安排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首先要在国内进行语言方面的学习，这就亟须建立一所干部学校。由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处于秘密状态，也需要一个公开的场所开展革命活动。于是，维经斯基的重要助手兼翻译——杨明斋经手租借了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的石库门房子。1920年9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由上海共产党早期组

织创办了这所革命干部学校——外国语学社。

这是一幢两楼两底一天井的石库门房子，楼上是办公室和宿舍，楼下是教室和餐厅。客堂间放着一张可供十几个人同时进餐的大圆桌。楼下的厢房里，放了一排排长凳和课桌，并挂起了黑板。楼上的厢房、客堂间，架起了棕棚，打起了铺板。楼上亭子间分别为校长杨明斋和较早来校的学员李启汉的卧室。楼上的客堂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办公室，里面放了办公桌和油印机等。楼上东厢房是一部分学员的宿舍，外国语学社的秘书俞秀松，来自湖南的学员刘少奇和许之桢以及来自安徽的柯庆施等曾住在这里。来自全国各地，操着南腔北调，却志同道合的青年人都在这里相聚。三尺讲台，豪情万丈；房子虽小，胸怀天下。

在这所青砖黛瓦的石库门里，除了外国语学社之外，中俄通讯社、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教育委员会也在此创建和办公，这里成为上海党团组织开展革命工作的公开活动场所。

学员大多是早期党组织介绍而来

外国语学社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旨在培养革命青年干部的学校。教师多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如讲授俄语的杨明斋、讲授法语的李汉俊、讲授日语的李达、讲授英语的沈雁冰和袁振英、讲授《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等。此外，维经斯基的妻子库兹涅佐娃以及青年教

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为加强对进步青年的教育和管理，上海早期党组织于1921年初在新渔阳里6号成立教育委员会，包惠僧担任委员会主任，杨明斋任副主任，主要任务是选择青年团的优秀分子去苏俄留学。在这期间，青年团从外国语学社

团成员和众工友奋勇迎敌。半个小时后，江岸已有30多名工友壮烈牺牲，200多人受伤，林祥谦的弟弟林元成也因被子弹击中头部而牺牲。

林祥谦在同反动军警搏斗中被捕，被绑在站台东侧的一根电线杆上。时值农历十二月廿二晚上，天昏地暗，寒风刺骨。他的妻子陈桂贞闻讯跌跌撞撞地赶到丈夫面前，声嘶力竭喊道：“祥谦，祥谦！有什么交代？”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林祥谦，听到怀有身孕的妻子呼唤声，焦急地对她喊道：“你不要管我，赶快回去照顾孩子要紧！”

张厚生用刀逼迫林祥谦下复工令。林祥谦严厉拒绝说：“此事乃全路三万工人生死存亡所系，我分工会非得总工会命令不能开工，头可断，工不可开！”他先后被砍7刀，宁死不屈，壮烈牺牲，年仅31岁。

中共建党以后第一次有党员捐躯的流血事件就是这次二七惨案，其中殉难的共产党员林祥谦、施洋当属中国共产党的首批烈士，而较早就义的林祥谦则是目前经考证可以认定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壮烈牺牲的第一位烈士。2009年，林祥谦荣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林祥谦烈士用率先垂范、英勇奋斗的实际行动为中共党史增光添彩。他那“一身报国有万死，浩气冲天贯斗牛”的英雄气概与“赤诚报国，勇于担当；乐于助人，为民造福；坚定信念，英勇奋斗；严明纪律，无私奉献；坚贞不屈，勇于献身”的人格精神仍然激励后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中选派了30多名学员分批被送到苏俄，多数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当然，由于革命形势需要，也有一些学员留在国内开展革命斗争。在这些学员中，很多人后来成为革命和建设的卓越领导者，包括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任作民、柯庆施等。我们更不能忘记从外国语学社走出的罗亦农、俞秀松、李启汉、汪寿华、谢文锦、王一飞、梁伯台、傅大庆、吴芳、雷晋笙、陈为人、叶天底、刘汉之等为中国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先烈们。

早期党团组织在外国语学社所从事的革命活动还是引起了法租界的警觉，遂于1921年4月29日，被巡捕房搜查。自此，外国语学社的活动受到法租界严密监视。8月，外国语学社宣告结束。更重要的是学社特别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安排学生到工厂调查，帮助编辑报刊，到街上散发传单，到工人夜校教书，参加工人罢工等，以多种形式开展革命活动。

外国学社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以及共产国际的推动下，由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革命干部学校。外国语学社办学特色鲜明，从创办之日起，就烙下了深远的红色印记，体现了开创性、灵活性、革命性、国际性的特点。外国语学社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干部队伍的壮大，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